

林美玫 著

妇女与差传：

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
在华差传研究

WOMEN IN MISSIOLOGY:
The Study of the Episcopal Wome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Endeavors in China
(1835-19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林美玫 著

妇女与差传：

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

WOMEN IN MISSIOLOGY:

The Study of the Episcopal Women Missionaries
and Their Endeavors in China

(1835-19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妇女与差传: 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 /
林美玫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97 - 2107 - 0

I. ①妇… II. ①林… III. ①基督教史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3166 号

妇女与差传: 19 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

著 者 / 林美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徐思彦

责任编辑 / 赵 薇 马 爰

责任校对 / 高忠磊 谢 敏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6. 75

字 数 / 448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107 - 0

定 价 / 69.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序 一

面对“谁是你敬重的人？”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会得到很多感动人、有趣、意想不到的答案！

“我所敬重的人”就是任何一个在生活中，能忠心以他（她）们从上帝所得的恩赐、才能、爱心，尽到他（她）被呼召所担任的事工、职份、角色该有的责任，让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国家、世界，因此更和谐、安详、进步、平安、喜乐！都是我们所该敬重的人。

对本书中所有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能不顾自身的安全及经济、文化、性别、宗教的困难和压力，而离开她们的本地、本族、本乡，和她们所爱的亲朋好友，来到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去做差传工作的妇女们，她们奉主名工作的果效，绝不是只在当时社会中：信仰、教育、医疗、女宣、生命的更新等方面而已，而是延续到今天。这些用生命尊主为大、为主而活接受差传，去福传与服事的妇女们，是我们所该敬重的人。

林美玫博士会用十多年的时间，那么深入、详实地去完成《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这个冷门却非常有意义的主题研究，是她用学有专长的恩赐，并以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以实际著书写作的行动表达对父母与长辈的孝心和对所有接受差传妇女们的敬重！认识她这么多年，我十分肯定她是个谦卑、顺服，用信心依靠、仰望上主赏赐她智慧与能力的基督徒。她向我见证说：“若没有上帝的恩待、怜悯、扶持和引导，我完成不了这个论文。”愿主赐福她的服事和她前面要走的路。林美玫博士是我所敬重的人。

您会选购或借阅此书，我猜想是因为您期待深入了解“妇女与差传”的历史事实与真相、想装备事主爱人的生命态度，或是借着对此书的阅读

而增进历史知识，并影响您有更积极的人生观及生命价值观，相信您也会成为被亲友、同事以及我所敬重的人。

愿上帝怜悯、帮助我们都能是个敬畏主、服事人、蒙祂所喜悦，去归荣耀给祂的门徒、仆人。

赖荣信 主教

序于台湾圣公会教区

公元 2010 年 8 月 6 日

基督易容显光日

序 二

得悉林美玫女士的大作即将在大陆出中文简体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去年我和杨卫华编著的《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研究入门》一书中，就向有心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生们推荐了此书。实际上，所有对这个领域有兴趣的人读这本书都会有所收获的。

自 1807 年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来华，基督新教入华迄今已二百余年，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基督新教随着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而跌宕起伏，其本身的历史无疑也成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大陆原本是“禁区”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青年学子的重视，大家也越来越关心海外研究的进展。对起步较晚的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研究的关注尤其如此。

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学者才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领域。^①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常所说的“妇女的工作为妇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之上，即在华女传教士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进行的活动。其中，亨特（Jane Hunter）1984 年出版的著作《高雅的福音：世纪之交在美国的美国女传教士》（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开这一领域的先河。在书中，亨特首次引入了许多研究的专题，如：独身的和已婚的女传教士的专业角色、女传教士集中于家庭领域的福音布道工作、“帝国主义的福音传道”和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等。从这个开端发展过来，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第一，女传教士们在家庭福音传道、教育、医药等领域中对中国妇女

① 1970 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小海亚特（Irwin T. Hyatt）的《19 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和柯文（Paul Cohen）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1900 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使得西方英语世界的学者们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研究领域。

所开展的工作。在近代中国严格的宗法社会中，强调“男女之大防”，因此男传教士难以向中国妇女传道，而中国妇女往往又是中国家庭能否皈依基督教的关键，所以女传教士成为教会在妇女中实施传教工作依靠的对象，得以在传教中发挥重要作用。^① 第二，女传教士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职业上的机会和社会的自由。这方面的论文认为，尽管妇女传教士和男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情况，但是毋庸置疑，在中国担任教师的女传教士们自身事业的发展要大大快于身处母国的姐妹们。大量有关在华女传教士的研究详述了这些女性在中国享有的职业机会和承担的责任。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原因就是女传教士们离乡背井远赴中国进行传教的动因。^② 第三，中国女信徒与基督教传播。这部分的研究开展得并不充分，华人女基督徒及其历史通常被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方面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郭佩兰（Pui-lan Kwok）1992年出版的《中国妇女与基督教（1860～1927）》（*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 - 1927*），该书采用“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皈依基督新教的中国妇女进行研究。郭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在这一时期逐步增加了在教会中的参与程度和领导作用。她们通过挑战像缠足这样的中国传统参与改善中国妇女生活状况的社会改革。^③ 总之，过去的三十年里，西方学者为重建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历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限于资料和语言等问题对中国妇女的研究

-
-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见 David T. Morgan, *Southern Baptist Sisters: In Search of Status, 1845 - 2000*, Macon: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jorie King, "Exporting Femininity, Not Feminism: Nineteenth-Century U. S. Missionary Women's Efforts to Emancipate Chinese Women," in Leslie A. Flemming (eds.) *Women's Work for Women: Missionary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89;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 - 1930*, New York: P. Lang, 1995; 凯瑟琳·鲁德威克在对传教士在海南苗、黎等土著少数民族中开展的传教工作的研究中，也涉及“妇女在教育领域的工作”这个主题，见 Kathleen Lodwick, *Educating the Women of Hainan: The Career of Margaret Moninger in China 1915 - 1942*,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 ② 例如：Janet Lee, "Between Subordination and She-Tiger: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White Femininity in the Lives of Singl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05 - 1930,"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9, No. 6, p. 627; Li Li, *Mission in Suzhou: Sophie Lanneau and Wei Ling Girl's Academy, 1907 - 1950*, Asian Studies, No. 2, New Orleans: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outh, 1999; Rhonda A. Semple,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Great Britain: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 2003.
- ③ Pui-lan Kwok,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 p. 115.

仍较薄弱。^① 两百年间经由外国差会派来中国的女传教士数以千计，中国女信徒更是难以计数，但进入研究者视野的，除了几位知名人物外，真是寥寥无几，研究现状和历史事实难成比例。

从这个角度来说，林美玫的这本《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恰好可以看作是对上述研究缺憾的弥补。林教授早年获得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台湾花莲寿丰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她耗时七年半用心研读整理位于奥斯丁市的圣公会全国档案馆的“中国差传档案”，完成有关19世纪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的博士论文研究。返台任教后，又先后利用六个暑假重返奥斯丁继续研读圣公会全国档案馆的“中国差传档案”，终于写就此书。该书既向我们揭示了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内部的复杂多样性，又挖掘出圣公会在华女传教士的一个个集体性个案，并结合美国宗教史、美国妇女研究、中国妇女研究与基督宗教在华史来阐述十九世纪中美两国妇女在宗教—性别—文化上对话的意义，具有全球化、跨学科的显著特点，是近年来“妇女与宗教”研究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佳作。

每个人对自己从小生长的环境最熟悉，论起旧地的风土人情自然可以滔滔不绝，但如果要让他谈谈百里外的陌生之地，则难免哑口无言。历史研究亦是如此。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做这样一个“美国圣公会在华女传教士”的题目，没有一点美国史方面的学术训练和美国生活经历垫底，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就无力进入这些女传教士所处的时代情境中去，无法写深写透。林著则不然，因为作者有中国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的双重修养，又凭借着对美国宗教及圣公会研究的学术史方面的熟稔，所以对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与女传教士的宣教动机都交代得相当到位。在分析归纳以往美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更是大胆将“纯正妇女意识”和“妇女性别空间”这两个概念及理论引入到大批的美国妇女为何会从事教会工作的理性思考之中，从而开辟了新的解释路径。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随着“西进运动”的不断拓殖，铁路、蒸汽机船的出现，伊利运河的开通，进入了工业经济初步腾飞、劳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美国妇女也不再只扮演安守家中、相夫教子的角色，而是纷纷

^① 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参考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戴懿华（Melissa Dale）撰写的《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现状》，特此表示感谢。

进入工厂，赚钱养家。就是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美国南部的棉纺工厂里，年轻的白人女性一边操作机器，一边背着工厂主偷偷学习文化知识。正是从这批劳动妇女中间，产生了女教师、女作家等新兴的职业妇女群体。妇女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其经济独立性也进一步提升，随之带来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妇女意识在当时被称作“纯正妇女意识”，它强调虔诚、纯洁、服从、爱家，让妇女期待成为社会所需的道德维系者，并要求其超越家庭，影响社会。在宗教领域，随着美国国内第二次宗教大觉醒的不断深入，“妇女更具体地获得突破以往传统限制的动力，藉着宗教复兴的聚会，来肯定自己是社会中道德的捍卫者”。而妇女宗教复兴的聚会及由此产生的宗教姐妹情谊，又衍变成一种妇女宗教社团主义，“在教会有形的支持及宗教信仰无形的助长下，妇女组织志愿团体，她们彼此不再孤立于自我家园之内，反而借由教会主导的社会活动来帮助建构一种宗教性的姊妹伙伴关系”。在提出上述美国的社会及宗教背景之后，林美玫女士把这种“纯正妇女意识”用来解释圣公会女传教士在中国宣教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各自形象的心理层面的原因，即保守型、积极型、调和型这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可以相应地用来描述女传教士在中国差会内部和男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即她们的自我定位分为男传教士的助手、合作者、挑战者这三种角色。林美玫的这种解释路径打破了以往那种对国外传教士单一性叙述的倾向，向读者展示了男女传教士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协调的性别张力，颇有开创性。

如果说“纯正妇女意识”注重刻画妇女意识的内在纹理，“妇女性别空间”则更强调妇女力量的外在具体表现。它既有私密性和有限性，又有公共性和延展性，实际上是当时妇女争取突破原有的家庭限制，进入到男性公共空间的一种尝试，是对女性主体价值的肯定与捍卫。在19世纪的美国，道德改革运动、禁酒运动、女权运动、慈善事业及妇女俱乐部的成立都是“妇女性别空间”的展现。林美玫认为“女传教士在华的所作所为是‘妇女性别空间’概念的延伸，在女传教士的个人工作态度和行为上，或有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展现出此概念对她们的影响”。可以说，19世纪以来华的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借由宣道、教育或是慈善事业和中国妇女接触了解的过程，也是中美妇女展开性别对话的开端。中国近代教会女子教育的翘楚——上海圣玛利亚书院则是“妇女性别空间”的现实化身。作者不惜花一章的篇幅来向读者展示中美两国妇女经由这所教会女学所建立的妇女

宗教网络与性别对话的空间。圣玛利亚书院正式成立于清光绪七年（1881），由原先的文记女塾和俾文女塾合并而来，同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提议，将校址搬迁到圣约翰书院西侧（今万航渡路），华人黄素娥任校长，学生一律寄宿。早期入读的女学生，除了信徒的孩子外，有一大部分乃是弃婴以及穷苦人家无力抚养而交由教会的孩子，她们在这里学习的课程包括四书五经、圣经教义、西方科学、音乐、英文、体育等，成长为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大不相同的近代知识女性。至于这些女生的毕业出路，除了一些和教会内部的男信徒结为夫妻之外，“或为女传道、女舍监、女助手，总有一个出路可以将她们的信仰和知识结合在一起，教会女学便成为中美妇女一个属于她们性别对话的有力空间”。直到如今，如果你步入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在电脑里查阅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圣玛利亚女学的档案，就会看到当时学生写的作文、小诗，还有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活泼色彩的黑白照，以及毕业同学互赠的俏皮的评语，时间恍如就在此刻被凝住。你会发现这所后来培育出名作家张爱玲的教会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19 世纪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然巨大，要想在“异域”顺利地宣教，任何照搬照抄国内经验的做法必然是要碰壁的。作者根据妇女民族差传学，从种族—性别—阶级的研究角度切入，探讨在这个农业经济仍占绝对主导地位而且充满“异教徒”的社会中的妇女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美国国内行之有效的“妇女性别空间”这个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社会应该如何转换以达到启发广大妇女的宗教目的。女传教士梯山航海，初来异地，面临的不仅仅是“水土不服”的问题，还有宣教策略的转变，以及内心思想与外部世界的调和。读者可以通过汤真爱、费理雅、钟爱玛、劳莎拉、钟凯琳、文海莉这些不同时期来华的圣公会女传教士，去发现体会她们在教育、医疗及宣教工作上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与之相伴的内心的种种欢喜和忧伤。应该说，女传教士在清末民初推行或倡导的禁烟运动、“天足”运动、禁止溺婴、加强女子教育、呼吁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行动也证明了“妇女性别空间”在中国社会的有效转换以及有力拓展。那么，女传教士所营造的空间对于她们所接触的中国信徒，尤其是女信徒，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女传教士和中国妇女是否有基于共同信仰而建立一个共属和对等的关系之可能”？毋庸讳言，女传教士的到来及其在工作上的表现对于中国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定位及性别伦理准则会产生相当大的刺激和震撼。当

中国妇女亲眼看到这群来自大洋彼岸的女性，她们能说会道，可以走家串户，还长着一双大脚，对其心理冲击可想而知，促使中国妇女去反省和检视男权社会加诸身心的种种桎梏。由于受到关于19世纪中国女信徒资料欠缺等因素的限制，我们当然不能人为地夸大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把清末民初的历史一以贯之，则会发现女传教士对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确是作了早期预备工作。因此，称其为“女子启蒙者”是名副其实的。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中美妇女之间这种经由宗教的有形或无形的对话，并非单单只对中国妇女有益。对于这些远渡重洋，有强烈自主空间意识的女传教士来说，“如能通过在异教文化下生活的种种不便，可能比美国国内的妇女更满足于差传公共空间所带来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总之，林美玫的这本著作向我们展示了过去少为人知的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19世纪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19世纪中美妇女在宗教—性别—文化上的这种对话直至今日仍具有现实参考价值。历史证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各自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能是谁压倒谁的“零和游戏”。只有强调和而不同、共谐共荣，才能带来全球意义上的和平与繁荣！最后，祝愿林美玫女士再创佳绩，结出更多的学术成果，是为序。

陶飞亚

2010年9月

自序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主顾念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主的名称为圣。主怜悯敬畏主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公祷书·尊主颂》（台北，台湾圣公会，2010）

本人在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就读时，因撰写《中国内地会之研究（1865~1926）》硕士论文（现已增补为《信心行传——中国内地会在华差传探析（1865~1926）》，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开始投入基督宗教（尤其是指基督新教）的研究领域。在论文准备期间，深觉除了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术训练外，还必须在美国史和美国研究的领域获得更扎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在申请到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exas, U. S. A.）的入学许可后，到该校历史系就读，以美国史为主修并以近现代中国史为辅修。在取得美国妇女史的硕士学位之后，以美国宗教史、近现代中国史、基督新教入华史和美国圣公会专题研究为研究进路，将19世纪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档案做了耗时七年半的研读和整理，并以“The Episcop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35 - 1900”博士论文，获得历史学的博士学位。

返台之后，先后服务于嘉义民雄的中正大学和花莲寿丰的东华大学，除了在相关教学上加强研究背景的知识外，还利用六个暑假（1995~1999年及2003年）重返位于得州奥斯汀市的圣公会全国档案馆（Archives of Episcopal Church, Austin, Texas, U. S. A.）继续阅读“中国差传档案”。档案馆卸任馆长 Dr. V. Nelle Bellamy（1922 - 2009）、现任馆长 Mr. Mark J. Duffy，馆员 Mrs. Elinor Joy Scott Hearn（1925 - 2004）、Mrs. May Lofgreen 和圣公会西南神学院（Episcopal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Southwest, Austin,

Texas) 图书馆馆员 Mrs. Patricia Booher, 都在他们的专业上给予本人许多的协助与支持, 本人由衷感谢。因此, 本书撰述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形成, 虽然花费了相当的心力、时间与金钱, 但若没有美国圣公会全国档案馆及西南神学院图书馆在专业服务上的支持, 是无法将 19 世纪女传教士在华差传图像加以具体呈现的。

在撰写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系列研究, 修改、增补和成书的过程中, 本人要特别感谢母亲林石全美女士 (1918 ~ 2008)。由于家母一直以外祖父石紫阶牧师 [属瑞典行道会中国教牧, 湖北黄州 (今之黄冈) 福音堂] 和外祖母郝葆真女士希望后代子孙能为教会历史留下记录的心愿为念, 母亲遂成为本人求学期间能够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在美国阅读传教士书信档案的财力支持者和精神鼓励者。在完成博士学位后, 还能趁暑假重返美国从事圣公会在华差传的后续研究。更由于家母毕业于圣公会在湖北武昌的圣希理达女子中学 (St. Hilda's School for Girls, 今之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 她时常提及任职该校女传教士老师如贾居理 (Ms. Julia Clark, 为圣公会女会吏) 和班导师顾思莲 (Ms. Hazel Gosline), 以及喜爱为教会及学校制作木头家具的孟良佐主教 (Rt. Rev. Alfred A. Gilman, 1878 - 1964) 等人的轶闻趣事, 使本人在阅读传教士书信档案时, 觉得有一股亲切感而得以支撑下去。如今, 当有机会将女传教士系列研究以中文简体字版做具体呈现时, 家母已经离世。该系列研究的重新整理与增修, 遂成为本人纪念母亲的馨香之祷。

再者, 由于 6 岁丧父, 本人是一手由母亲带大的。返台工作后能娱亲的时间还是相当的少, 深觉亏欠。家中大小事由大姊林美玉女士照顾和张罗, 本人才得以全心全力投入教学与研究。因此, 大姊在家务上的分劳使本人得以顺利完成《妇女与差传》的中文繁体字里仁版和中文简体字增修版, 在此表达感谢之意。除此之外, 旅美继续查档期间, 长居美国华盛顿的大哥林道存先生、芝加哥地区的二姊林美珍女士, 得州奥斯汀市的薄启印弟兄和冯元玲姊妹、黄汉和弟兄和魏洁珑姊妹, 得州休斯顿市的马幼侠老师和石永玲姊妹, 以及加州旧金山地区的胡道光弟兄和黄妙纾姊妹, 给予我居住、交通及饮食上的帮忙和协助, 也在此一并致谢。

2004 年秋冬, 本书 (台北里仁书局中文繁体字版) 各章论文增修、改

写和定稿过程中，如果没有杨智雯、何幸霖、周家绫同学在电脑排版、文稿校对和资料检索上的帮忙，本人实在难以兼顾教学、服务与研究的要求。2010年初夏，本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文简体字增修版）各章增补资料、网络检索、文字校对过程中，如果没有周家绫在工作之余协助帮忙，杨智雯在德国进修仍透过网络鼓励，和在校生林宜依补印必要的专书论文以供参考，本人也很难尽全力将简体字增修稿做最好的呈现。她们的爱心与支持，感念在心。

至于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上有关教会本身传统、仪式、礼文、组织等专有名词的疑难，本人有幸获得圣公会台湾教区简启聪主教、赖荣信主教、林应求牧正、魏斐然牧师等教牧（圣品）和马汉宝法制顾问的指导，在教会专有名词的中文翻译上获得比较贴近19世纪圣公会上海教区教务发展相关组织名称的原旨。再者，本人更因为获得2003~2007年度“行政院国科会专题研究计画”补助，从事台湾教区教会史料的建置工作，得以亲身观察圣公会各堂的主日崇拜、教区设教50周年的活动（2004年）、教区年议会的教务讨论、教区办事处人员工作实况等，对圣公会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教务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在准备改写增修本书中文简体字书稿前，于2010年3月5~7日台湾教区年议会期间，本人有缘和服务于台湾教区的英国圣公会所属传教团体（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女传教士李凯琳（Ms. Catherine Lee）同住在她在淡水圣约翰科技大学的宿舍。与李凯琳同进同出地度过三天，亲身感受到女传教士所散放的坚毅、虔敬、自律、爱心的性别热力，更有助于本人对19世纪圣公会女传教士性别世界（gender world）的理解。本书中文繁体字版和中文简体字增修版的完成，实在有赖当前由赖荣信主教所领导的圣公会教牧和信友的提携与鼓励，增强本人对圣公会在华开拓教务的洞察力，使这本专书更能反映过去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筚路蓝缕的艰辛。

最后，在本书中文繁体字版的首次印行以及中文简体字增修版版权的释出上，本人要特别谢谢台北里仁书局的徐秀荣先生和曾美华小姐所给予的一切协助与体谅。鉴于学术著作的市场极为有限，若不是当年里仁书局有此魄力肯出版这一本妇女与宗教的研究专书，本人将近十五年的查档、读档的研究心得就无法呈现在学界、教会界和一般读者的眼前

了。另一方面，本人也谢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思彦老师、赵晓阳和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的支持与鼓励。由于他们的牵成，促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来负责女传教士系列研究的中文简体字版出书计划，让更多华人读者认识基督宗教中妇女与差传的关系。在增修版中，特别增加《所传为何》的专章，使本人对19世纪基督新教女传教士研究有更全方位的呈现。总结地说，借由《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中文简体字增修版）专书的刊行，本人愿意在妇女与宗教研究领域方面，为从事学术耕耘者提供一部扎实的学术著作作为参考。同时，本人也期待研究者与读者能经由此书，展开一场信仰、理性与感性的对话。

中文摘要

关键词：基督宗教、美国圣公会、妇女与宗教、妇女与差传、妇女与文化、性别研究、中美关系史、比较文化、女性特质、女性主义

《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文简体字增修版）是以19世纪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女传教士和她们在华的传教工作为研究主体。由于美国圣公会是基督新教自1807年英国伦敦会马礼逊入华以来最早的九个传教团体中的一个，也是美国基督新教最早在华从事教务开拓的三个传教团体之一，这使圣公会女传教士在19世纪基督新教入华的宗教传播及其所造成的中西文化的冲击上，自有其特殊意义与代表性。

针对19世纪美国圣公会在华开拓教务的表现，作者依据美国得州奥斯汀市的圣公会全国档案馆所特藏的“中国差传档案”、《差传记录》、《差传精神》、《教会人》、“文惠廉主教家族书信专档”、《美国圣公会总议会记录》等珍贵史料，将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研究锁定在她们来华的差传动机、工作表现以及作为影响上。至于女传教士研究的研究进路，作者结合美国宗教史、美国妇女研究、中国妇女研究、基督宗教在华史、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学中的种族—性别—阶级的理念意涵和差传学中的宗教与文化的相互冲击理论，以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为个案，探讨19世纪基督新教来华、入华和在华时妇女与宗教互动的意义。

本书研究主旨在说明19世纪美国妇女愿意投入海外传教事业是与当时流行于美国社会的纯正妇女意识密切相关。此种妇女意识的孕育、倡导和推广，得力于美国国内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运动。再加上美国社会日益工业化、世俗化、商业化对原有社会道德秩序的冲击，使妇女对自己、家庭和社会充满一股不确定感。此种焦虑造成美国妇女在宗教信仰上作深度追